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七三期 ——
(二〇〇六年一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1a)

【千秋功罪】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上)	方 丈
【往事如烟】亲身经历: 毛远新执政期间的辽宁	李 工
【人物追踪】毛泽东之侄 17 年刑满后的生活近况	马社香
【史海钩沉】毛泽东和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李 刚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千秋功罪】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上)

• 方 丈 •

大家都知道, 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 那十年的生活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毛泽东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作, 和怎么作的, 是和文革有关的最重要最中心的问题。

1958 年毛泽东抛开当时的经济领导部门, 自己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 发动大跃进, 造成中国经济大灾难。这件事情成为毛泽东的心病。在中共历史上, 如果领导人发生重大失误, 必然保不住自己的领导权。如陈独秀因为大革命失败而被开除党籍, 张国焘因为西进失败而被整肃。遵循这一传统, 跃进刚刚失败, 彭德怀就站出来向毛泽东的领导权挑战。毛泽东在 59 年庐山会议镇压了彭德怀和其他人之后, 为了挽回跃进失败, 在 1960 年搞了第二次跃进。伴随这场二次跃进的, 是毛泽东倡导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经过 58、59 年的一次跃进, 人民生活已经十分困苦, 再次跃进阻力很大。所以必须加强强迫性, 才能推进二次跃进。这场二次跃进造成 60 年的全面减产, 农民生活更为困苦, 饿死的人大幅增加。毛泽东在 60 年秋收之后, 得知二次跃进失败, 农民大量饿死。就放弃了对经济的领导权, 让刘少奇接任。他自己去专心研究阶级斗争。毛泽东这次让权, 一来可以让刘少奇对付最困难的

局面，二来是他知道二次跃进的失败，必然会诱发更多的人挑战他的领导权。他专心研究的阶级斗争，就是指对这些挑战者的镇压。至于挑战者是谁，在那时还不清楚。但是根据他的经验，这些人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为此他组织了几套人马，其中包括：刘少奇一伙，林彪一伙，周恩来叶剑英一伙，康生江青一伙。这些是上层人士，下层的有陈锡联许世友等人。并重点扶持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位亲信。但是64年刘少奇突然表露出对毛泽东的不敬，使毛泽东大感意外，也使他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自己的老婆孩子才可以依靠。于是在64年起，他就开始组建自己的禁卫军，核心是江青毛远新二人，主要辅助人员是康生谢富治和陈伯达。文革自始至终，这二人核心（江青和毛远新）都是关键。讨论文革必须重视这二人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靠他们发动文革，也靠他们监视控制其他所有人，他们也忠实成功地完成了任务：直到毛泽东死去，其最高权力未曾有丝毫动摇。

一般来说，禁卫军也必然是接班人。文革的最大的疑问，是毛泽东到底是否想让江青和毛远新接班。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最后让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理。如果不想，为什么给这二人以最大的权力，到最后还让毛远新负责整肃邓小平。有人认为毛泽东只想使用他们，为其保驾，并无意图让其接班。毛已经打算好，自己死了之后，让别人把江青毛远新解决。这是现在的正式的说法。如果这样，毛泽东用亲人为自己殉葬。这倒是亘古未有的现象。笔者以为，毛泽东始终准备让毛远新和江青接班，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事情没来得及做好。在他死的时候，认为已经作的差不多了。还剩下一些，靠江毛二人自己能力，或许可以完成。另外，他也看错了一批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和陈锡联。毛以为叶可托孤，另外三人不足以对江青和毛远新构成威胁。而且因为资历浅薄，必须依靠江毛（远新）才能保住高位。所以应该说毛泽东最后还是准备让江毛即位，只是安排不当。我们就先看看毛泽东如何培养毛远新。因为毛泽东不但依仗他作禁卫军，也准备让他当继承人。

一．太子毛远新

毛远新受毛泽东的精心培养。文革之前的1964年，有这么一篇”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可以说是点燃文化革命的第一把火。毛远新的名字也就和学生革命，发生了最直接的联系。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毛远新已经从哈军工毕业。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派他回到哈军工，指挥当时的学生造反。哈军工的教学水平，比不上清华北大复旦等学校。一来是因为63年以前的入学标准，注重出身和政治表现。对于学习成绩并不是很重视。二来是好的老师，到军工教学的不多。毛远新这样的学生，如果想学科学技术，应该到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但是哈军工有他的特点：该校原来的宗旨，是培养下一代军队的领导人（但是在文革中此宗旨被废除）。毛远新如果在军工成为学生领袖，对他以后在军队建立领导地位，有特别大的好处。毛泽东的观点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对毛远新的生涯设计，是让他成为新一代军队干部的领袖，从而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并以军队为依托，掌握政权。

毛远新在65年从军工毕业，66年却回到哈军工，领导学校文革。这时他还没有明确的地位。只是作为老校友。当时人们对后来流行的“关系学”还不了解。学生们还错误的相信“大公无私”，所以很多学生不把毛远新放在眼里。实际上他的代表着毛泽东本人或当时的文革小组。当时军工的保守派“八八派”曾出言不逊，说“毛远新算是什么”。毛远新说他什么也不算，只是个红卫兵。这只能说明八八派的工农子弟对中国的政治不了解。他们不知道毛远新的背后是什么。过不了几天，八八派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保守组织。该派领导宣布组织解散。这是六六年底发生的事情。

毛远新从军工获得文革经验之后，在68年被派到辽宁，这次是作为“总理联络员”。这种头衔可能只有他有。在当时的辽宁，他就代表着中央文革和总理，所以有最高决定权。当时辽宁分成三派。这三派分别是1，中央文革支持的“8.31”派；2，地方干部支持的辽联；

3，军队支持的辽革站。互相之间冲突激烈。因为后面都有上层支持，所以哪一派都不能获胜。毛远新去后，以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选中沈阳军区作为依靠力量，支持辽革站，压制了其他两派。让沈阳军区成为辽宁的领导力量。其他两派当然很不高兴。8.31派一个领导说：毛远新算什么。毛远新回答：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个总理联络员。就在不久之后，那造反派领袖被逮捕。

在解决辽宁三派斗争方面，毛远新是主持者，实际上是由他作裁判。其他人不可能反对。当然这完全是依靠他背后的力量，这力量就是毛泽东。他是毛泽东指定的领导人。在这之后，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主管东北地区的军政。因为当时整个东北的地方行政也都由军队接管。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当时任当时辽宁省革委会（当时的省政府）主任。黑龙江省的革委会主任是黑龙江省军区司令汪再道。（原为潘复生，后潘失势）。都在毛远新的领导之下。

毛泽东让毛远新主管东北，是为毛远新以后的发展作准备。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和能源基地。也是粮食、棉花和木材的生产基地。从经济上说，东北可以独立。而且东北有港口，有对外航运和铁路交通。东北和关内的联系。在陆地上主要靠三海关一个主要通道（其余通道，如承德，当时只通单轨铁路，不很有用）。如果一旦发生不利情况，可以把三海关一封，东北就变成独立王国，或反攻基地。也就是说，东北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内地政权征服东北的事情，从未出现。而东北地方力量征服关内的情况，比比皆是。清朝是一例子。后来的张作霖的东北军占领北平，打过江南，也是例子。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派他的心腹爱将林彪到东北，也是为了加强林彪的实力。在以后成为他毛泽东的军事支住。林彪靠着日本遗留下来的装备和苏联的支持（日本装备由苏联移交给林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建立起中共最强大的军队——四野。这都证明掌握了东北，就有力量图谋关内。但是掌握了关内，却不容易图谋东北。而且，关内地方太大，统一关内非常困难。如果中国发生内乱，最可能的情况是关内发生混战，而东北则保持稳定。这样更有助于建立东北对全国的优势。

所以毛泽东让毛远新坐镇东北，是老谋深算的一招儿。

再看当时的军区司令陈锡联，也是毛泽东安排在那里的一个合适的人。陈锡联善战，在政治上极善于见风使舵。陈锡联原属四方面军系统（徐向前，张国焘）。后随徐向前加入129师，任团长，在刘伯承邓小平手下工作。他和林彪并无任何历史关系。自从五十年代末调任沈阳军区司令，该军区的部队，多由四野林彪系统的部队组成。当年毛泽东让他到沈阳军区，就是让他监视四野部队。毛泽东对四方面军的干部，相当注重。因为该军善战，但是在西进失败，张国焘走后，四方面军在军事上一败涂地。政治上失去山头。这时候他们成为共产党内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毛泽东收留而且优待。其中三员大将（军衔为上将）：谢富治、陈锡联和许世友，掌握北京沈阳和南京三大军区，是毛泽东的禁卫军。帝王对禁卫军领导有特殊要求，就是必须绝对忠于自己。保证其忠诚的最好或惟一的办法，就是除了自己，他们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人物。谢陈许三位就是这样。在四方面军解体之后，四方面军干部只能依靠毛泽东。而且，他们是“吃过亏的人”。这“吃过亏”很重要，没有吃过亏，不知道政治有多险恶，也不知道自己的脑袋有多么不结实。吃过亏就不一样了。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领导张国焘，不管功有多大，官有多高，还不是像芝麻绿豆一样，被政治磨盘碾的粉碎。四方面军剩下那几个劫后余生的人，都是被“打服了”的乖乖仔。打仗很勇敢，政治很小心。坚决地忠于和感谢毛泽东本人。人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谢陈许三将和毛泽东的关系。没有这三人，在军区一级干部中就没有人制衡林彪。后来毛又提拔起李德生。如无这几个大军区司令，而让林彪掌握了沈阳北京和南京三大军区，在毛林之争中毛可能就不能取胜。另外毛还始终让周恩来、叶剑英参与军委工作。这都是毛制衡林彪的办法。

在文革一开始，陈锡联是被冲击目标。笔者估计，在林彪的计划中，陈锡联属于应该被清

除的人物。因为林彪从来只相信自己的四野的老部下。当时驻东北的部队大多是四野的后代。高中级干部主要是四野的。林彪用东北作基地，最为方便合适。所以整肃或赶走陈锡联，可能是林彪的计划。但是毛泽东不能让林彪这么干。毛一定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他着力支持陈锡联。而且派了自己的侄子来支持陈。这是对陈的大恩。当然陈锡联也不敢得罪林彪，他作了一些样子。他整肃了沈阳军区非四野出身的干部。这类干部在沈阳军区本来就不多，而且也不在重要岗位上。主要有刘转连和黄立清。当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的黄立清是贺龙老部下，在文革初期和陈锡联说悄悄话：如果他们（指四野干部）要整我，我就到贺老总那里去告他们。这事只有陈和黄知道，陈也揭发了。黄在文革中被关押近十年之久，到了文革结束才放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刘转连，在沈阳军区本无大权，平时也小心，但也被整肃。陈锡联还靠拢军区中的四野干部。对他们广泛越级提拔。当时的军队的一个部门，常有二十几个副部长。而整个部的编制也是二十几个人。虽然有了这样的表现，但是陈锡联仍然难以得到林彪的信任。

当时林彪在军队中全面地清除一野（彭德怀）和二野（贺龙）的干部，打压三野（陈毅）势力。如无毛泽东的支持，上述几个军区必然落入林彪之手。在“解放军支持左派”之后，林彪的军队全面接管地方政权。毛江等人苦心发起的文革，其胜利果实大部份落入林彪之手。而且林彪的收获过程，如此轻松便利：造反由中央文革发动，到后来局势失控，必须由军队接管。这使毛林之间的冲突迅速激化。

二．扶不起来的阿斗

毛泽东派毛远新到东北，有几个目的，其一是支持陈锡联，管住四野的干部和军队。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在东北培养毛远新自己的势力，准备以后接班。应该说毛远新完全有这个条件。或者说，如果毛远新只是个中等才能的人物，也有可能作到这件事。因为他的条件实在太好。毛泽东让他在军工上学，为的是结识同学。军工学生的政治经验丰富，全体参加过四清，受过军事训练，组织纪律性较强（军工在文革前半年才取消军队编制）。如果当时毛远新能召集同学，许以前程，拉起一方势力，绝非难事。但是这位太子实在是太不中用。从1968年起，他把在东北的6、7年宝贵光阴，用来玩女人和洗照片。他一个军工同学也没有搜罗。也没建立自己的新干部基地。只把谢富治的女儿和女婿安插在鞍山。谢富治（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是江青的最重要依靠。谢富治把女儿女婿放在毛远新的手下，也是希望和毛远新共进退。后来也确实是这样。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军工学生，但是毛在军工的时候（60级），谢还没有入学（65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老一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毛远新自己收罗的干部。另外，毛远新对当时沈阳军区的干部，也几乎没有来往。军官们都拿他开玩笑。一是说他搞女人，一是说他看外国电影。三是说他的太太的古怪而可笑的行为。所有这些，也惹得老军官十分不满。比如，他喜欢看球赛。有一次在大连举行兰球赛。老军官们也有不少出席。在座位上等了很久，毛和他的上海太太才到，到了之后前排老军官全体起立，这二人对他们视而不见，走到中间预留席位，把江青式斗篷一裹，坐下，球赛开始。老军官们还站着。

陈锡联当然把毛远新坐镇沈阳，当作毛泽东对他的大恩宠。军区干部们在大礼堂开会，可以看到这样一幕：毛远新和陈锡联都坐在主席台中央，毛开始掏口袋，陈也开始掏，毛拿出香烟，陈拿出打火机。毛把烟往嘴上一放，陈把火送过去。毛远新到东北时没有结婚。他的择妻标准，也颇特殊。有三不要：不要干部子女，不要学医的，不要军人。这对军官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当时老军官们的女儿，几乎全部都是军医。毛远新的太太是上海工人。毛虽然年轻而且身强力壮，但却喜欢住医院。原因是有女护士医生围绕于周围。当时辽宁军区司令杨某（或政委）的太太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主任，是他的大皮条。当时高干病房有一上海籍护士，她的妹妹来探亲的时候，被司令太太看中，供应给毛玩了之后，回到上海，即报告怀上龙种。实际上这事也不算什么。但是在上海的那些文革干将，早就把这事当作大事来办。因为这些人（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是“江青班底”。和毛远新的关系不深。如果毛远新真的要拉起自己的班底，

江青班底有可能失去权势。所以拉紧毛远新和上海帮之间的关系，对于上海帮是极端重要的是事情。所以在上海帮的极力鼓动之下，江青说服毛远新娶这位年轻女工。当时，从上海发出送亲专列。全体大员欢送。在沈阳全体大员到站迎接。堪称当时的太子大婚。

但是毛太太很快就流产了。而且一流再流。这就使龙脉危悬，当然，毛远新完全可以和其他女性生养。但是名正言顺的后代，还是至关重要。所以后来毛太太一旦怀孕，立即作全天卧床休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姑娘，全天卧床，大小便都在床上进行，心里如何能高兴？也是因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伺候她的医生护士——几乎全是军区干部的女儿，少不了恶语喝叱。而这些干部的女儿是成伙成帮的，一来他们要轮流伺候这位公主，二来他们也互相转告，并告诉他们的兄弟和男朋友——这就是军区的干部子弟集团。当然也向父母诉苦。使他们对毛远新及其太太的看法，更加恶化。

总而言之，毛远新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实为自杀。非但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反而得罪了部下。至于毛远新为什么会浪费这宝贵的几年时间，只能说他本人素质太差。据军工同学说，他在上学时就不努力学习。因觉得学校（在哈尔滨）生活艰苦，经常回北京或其他地方休养。校方从来不敢过问。毛从小只需付出很小努力，就可获得拥挤过来的夸奖和提拔，所以认为自己根本不用努力，就活该青云直上。据说毛远新还喜欢耍小聪明，让别人写了东西，自己抄了读给毛泽东听，以显示自己喜爱读书和有理论水平。而毛也居然轻信。这或是因为毛远新是毛家族的惟一继承人，在毛的心目中地位过于重要。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毛的在东北浪费光阴，也受到上海帮的鼓励。毛当时用的摄影和冲洗器材，据说都是江青从国外买了送给他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毛远新和上海帮的关系不深，甚至不好。后来毛远新到了中央当主席联络员，和上海帮既发生冲突。以毛的傲慢，根本不把王洪文等人看在眼里。而王是当时的副主席。所以毛如果真的拉起一个大势力，并能独立生存，对上海帮实在不是好事。所以上海帮和江青有可能故意鼓励毛虚度光阴，并坚决地不让他接近军工同学——当然毛也没有这种愿望，如此可迫使他以后依靠上海帮。

三．毛家传位和林家接班

毛泽东的家族传位，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不是新鲜事。我们知道，蒋介石、金日成都传位成功。李光耀也成功。所以毛泽东认为自己的传位应有很大的把握。但是他失败了。这一失败算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当然很多人会说，这算是什么进步？但是我们要看看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政治进步就是这么慢。袁世凯当了总统，还是要当皇帝，还是要传位给儿子。实际上孙中山也有传位倾向。只是因为太子孙科没有进入军界，只好让蒋介石代为传位。实际上蒋可以算是孙的外戚。以外戚扶持太子，历史上屡见不鲜。后来蒋果真扶持孙科。孙科当了行政院长，自己有了一派势力（政学系），也曾企图作民国总统，但是因为没有军队而不可能成功。所以说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领导人的继承，一直就是家传。只有共产党内部实行了能人领导。这也是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的原因。蒋经国让李登辉接班，算是变成能人领导，才改变了家传传统。政治进步非常缓慢。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能人领导已经算是共和政治的一种。如果共产党能够保持能人独裁，也还算是保持了共和。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破坏能人接班，而欲谋家人传位。他失败得很彻底。毛泽东的太太和继承人毛远新都被抓起来。从那之后就没有传位和家天下的问题了。邓江湖都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太太搞出来当大官，也都没有企图传位。而是利用改革开放，让孩子们进入商界，赚足几代的财富。同时让能人接班。这就是进步。我们再看看“传位动机”在文革中的作用。

古代帝王传位不止是为了儿女当权，也是为了在老皇帝年老能力减弱的时候，由儿子以太子的权威，护卫老皇帝的地位。毛泽东的情况与此相同：他的传位和保位是一体化工程。为了

保位必须建立江毛（远新）的权威。建立了毛江权威，就帮助他们即位。一般如果帝王的儿子年纪比较大，就可在老皇帝健在之时，就让小皇帝接班，然后让小皇帝培养自己的势力。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都是这么一种接班形式。毛泽东也这么作了。他用文革的十年时间，帮助毛远新扩大势力。除此之外，毛泽东采取了双保险办法，就是使用太后和顾命大臣。我们知道，小皇帝年龄太小，就必须让皇后垂帘听政。等小皇帝长大了，皇后就可以移交政权。但是皇后作传位中间人有危险，因为皇后很可能自己的把住政权不放。比如吕后、武后和慈禧太后。所以又需要顾命大臣。顾命大臣掌握部分军权政权，在小皇帝弱小的时候，顾命大臣可以帮助他，直到小皇帝长大，自己建立自己的大臣队伍。毛泽东曾想让林彪当顾命大臣。毛泽东对江青信心不足。不足的原因一是他知道在中国没有军队不能当权，二是认为江青和毛远新到底没有血缘关系。如果毛泽东真是要让林彪接班，那么在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应该说接班已经基本成功。但是毛泽东实际是想让林彪当个顾命大臣，没想让他接班。这时林彪突然花大力气培养林立果，并坚持要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就是国家元首。如果元首再掌握了军队，就足以对毛泽东的传位计划形成威胁。毛林之间的冲突因此激化。林彪也根本就不想当过渡人物，他的老婆和集团，都没有把毛远新放在眼里。都把林立国当作林彪的接班人。当时林立果自己的班子，比毛远新的大得多，也张扬得多。虽然林立果的地位远不如毛远新。林立果在69年的时候，只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军级或副军级，虽然权力很大，但是职务并不高。直到他死，也就是这个职务。而毛远新在68年已经是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属正兵团级。毛远新在68年出道的时候，就是总理联络员，已经是部级。但是不知道是林彪身体太不好，自己糊涂，还是叶群主事，目光短浅。他们一家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真以为毛泽东自己不想传位，而让他林彪建立家天下。

自以为聪明绝顶的林彪，怎么就会犯这样的大错误，在毛的面前，明目张胆地“大树特树”林副部长（立果）。实在让人不解。笔者以为过去一段公案在林彪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段公案就是毛和张国焘之争。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主持红军总司令部（任红军总政委），毛眼看大权不保，即看准机会，带领林彪彭德怀的一、三军军团突然过岷山北上，逃离四川张国焘的控制。这一三军团只是红一方面军的一半，另有五、九两军团没走。但是一三军团是毛的井冈山嫡系。据说他们突破腊子口的部队，还是张国焘之前支援他们的四方面军的部队。当时一方面军人员太少，张国焘给他们支援了一批人和枪、弹（每团给四百人，每人带一百发子弹）。到了陕北之后，毛的力量仍然很小。但是，这时苏联突然派回一个人，假名张浩，实为林彪堂兄林育英。我们看看下面这篇文章（作者：汪幸福，原载《文汇报》），就知道林育英对毛的大恩：1935年7月，林育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中断，为了向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七大精神，并恢复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装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踏上回国之路。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走，11月初，他们到达陕西定边县，并与定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邓发代表党中央把林育英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林育英说：目前，中央有两件大事需要你来。一是党的白区工作没有负责人，你能否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担当起来；二是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团结问题也急需你来帮助解决。你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目前只有你做这项工作最合适。林育英这才知道，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毛泽东说：“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要尽快设法将他们拉回来。”林育英怕这工作做不好。“也许不能起作用。”毛泽东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文中说他奉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解决一、四方面军发生的分歧，并带有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的意见和密码，可与国际直接通电。张国焘很快收到了林育英的电报，但他仍然不愿意带领部队北上。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并去电命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中央”。林育英出席了会议。为配合这个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又建议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朱德发去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心里颇不是滋味。林育英的电报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自己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再一意孤行，就要背“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与此同时，在朱德等人的劝阻下，张国焘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南下计划。

过了几天，张国焘连续给林育英发了三封电报，气焰没有先前那么嚣张了。这一时期，林育英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他们取消第二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经过毛泽东、林育英以及朱德、刘伯承等人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中央”，同意北上。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部队前来与一方面军会合，决不再改变。林育英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毛泽东高兴地说：“你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白当，你为党和人民立了一大功。”10月19日，林育英从保安启程，代表中共中央赶往宁夏同心县城迎接二、四方面军。林育英得知朱德、张国焘还在关桥堡镇，又前行30公里，见到了朱德、张国焘等领导人。在关桥堡，林育英与张国焘单独作了长谈，消除了他的一些疑虑。1936年12月16日，朱德、张国焘回到了保安。

其中的下划线是笔者所加，意在突出张浩在挺毛灭张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当时共产国际还存在。世界共产运动为一家。所以共产国际说了就算。另外，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张浩自己的想挺毛，应该想到当时斯大林也可能看中了毛。或者说，斯大林终于看中了毛。因为斯大林一直看不上毛，但是，斯大林到底是个盖世枭雄，他看出毛虽然难以受控，但是五次围剿的经验证明，中国非毛不能共产。正是因为斯大林看中了毛，之后才会有对王明的整肃。如果斯大林还看重王明，毛也不敢下手。很可能因为这事，林彪认为毛家天下，本有其一半，这次又依靠他整肃了彭德怀和刘少奇，在毛死后，理该让他接班。而他之后是林立果，至于毛远新江青，根本不是竞争对手。特别是文革前期的事情，更说明这个问题，文革开始中央文革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四处造反，结果在什么地方也当不了政，只让他林彪军管，整个中国，除了上海，尽入林家之手。

我们再看毛远新：他当了沈阳军区政委之后，林彪就像看不见他一样，从来不曾花些许气力，在军内“大树特树”远新同志的权威。不但林彪自己不去参见太子，连林立果及其一伙，也从来不到沈阳拜大哥。却派人到沈阳军区去选妃子（在沈阳选中两名，由某医院院长送到北京）。现在很少有人研究68——73年林彪集团和毛远新的关系。实际上这一关系是文革大转折的关键。我们或许可以说林彪一家昏了头脑。如果林彪当时不把林立果搬到台前，如果林彪能尽全力巴结毛远新和江青，让叶群携林立果到沈阳拜见毛远新，那毛泽东可能就会让林彪顺利接班，充当台湾严家淦和新加坡吴作栋的角色。文革也就算是成功了。或许林彪在毛死后——林彪到底比毛年轻很多——再把毛远新和江青赶走，自己传位给儿子，也是可能的。所以林彪之败，第一败在其“得意忘形”：以为军管之后，毛泽东已经对其没有什么办法，他们已经可以建立林家天下。第二败在太小看了老周（恩来）。这老周实在比林彪高明不知多少倍。现在人说毛逼林走，实为周逼林走。周在离间毛林关系方面，可称为世纪绝谋。二十世纪两大谋略家，一为斯大林，二为老周。老周早知如果毛林联合，则中国必然退回到袁世凯时代，毛死后必然是军阀混战。现在不少人给林彪作翻案文章，多是不明白林彪人品低下，有将才无帅才，排斥异己任人惟亲，比蒋介石还差得远。他最糟糕的地方是不能容忍其他派系的干部。一、二、三

野的干部他都不能容。如果他来接班，必然导致其他山头的拼死一搏，很可能形成军阀混战。这就是袁世凯死后的情况。如果毛死后林彪接班，几乎肯定性出现混战局面。所以老周自从文革一开始，其总战略就是离间毛林，只要毛搞掉了林，则封建政治后继无人——再没有人有林彪的力量和野心。如果没有林彪挡路，中共内部还贮存着不少优秀人才，可能接班。在他们手里，政治就能进步。至于怎么离间毛林，这事除了老周任何人也作不成。最主要的办法，是让林彪权势扩张，使他忘乎所以，也让毛认为林成为自己传位的威胁。

四．周的谋略

我们都知道在文革之初，各政府部门都在群众中建立保皇派，比如辽宁就有辽联，保原省委和东北局。其他地方也有保地方政府的群众组织。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各级政府和工人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当时政府官员虽然腐败，而整肃知识分子和阶级异己不遗余力，但一直对工人不错。老工人都知道，文革前工人待遇不错，有工资和劳保。在五十年代工业品比较稀缺，一个单位有了自行车票和手表票，干部必须让给工人。所以工人对政府有好感，这就是资源。利用这个资源，可以打一场对江青的“夺权阻击战”。就是利用老工人，建立保皇组织（或保守组织），作为一派群众力量，和江青支持的造反派对抗。老周不是不知道如此保皇，并不可能阻止毛江的夺权，因为毛的力量太大，只需一句话，要让谁下台，谁就下台。江青的班底就能上台。但是，周的保皇行动，使全国的基层产生群众对峙，在很多地区发生武斗。比如武汉成都，还有沈阳哈尔滨。这样就使全国大乱。按毛的说法，是乱了敌人，但是实际上是乱了江青，因为江青原来计划的是全国都用上海方式夺权。就是让她选中一伙人，组织工人造反，再由她支持夺权，权力就归她掌握了。但是全国保皇工人一旦奋起，和江青支持的工人造反派互相对峙，造反派夺权就很困难：凭什么你们这伙工人能夺权，我们这伙工人就不能夺权？而且保皇派工人大多是出身比较好的。因为以前干部就是依靠这伙人。这伙人中党员很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当中，这些出身好，工作表现好的工人，最有资格获得权力。这样一来，造反派的夺权，变成了工人中间两派的争权。就是江青也不好办了。当时各地的情况普遍是：老工人，成分好，平时老老实实干活，表现好，听领导话的工人，是保守派，而年轻和出身不是很好的，平时工作表现不好，经常被领导批评的，是造反派。大工厂工人是保守派，集体所有制和商业系统的工人是造反派。相比而言，保守派的力量和人数比较大。江青完全没有料到保皇力量如此之大。她以为和上海一样，她一下令，保皇工人（当时保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欧）就全体倒戈。上海是这种情况，因为上海由江青集团直接控制。他们能够很具体地指导造反派实行一些政策。包括对以前保皇（保原上海市委）的工人实行怀柔政策。并且在夺权成功之后，立即把这些老工人，保皇工人吸收到造反派的队伍里来。但是在其他地区，这些年轻的造反工人一造反，马上引起老工人的反感。因为在以前的社会中，老工人，老老实实工作的工人，党员工人，听话工人的地位，比这些调皮捣蛋的年轻工人高，前者看不起后者，前者是长辈，是政府依靠的对象，可以管理训斥后者。但是一造反，事情反过来了。老工人当然不高兴。在这些地区，江青集团也不能控制这些造反派，造反派喜欢打人，打架，很残暴地批斗干部，生活也不检点。江青为了夺权，不管这些造反派的出身成分，一律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夺权以后，搞了一次非常彻底的“清理阶级队伍”，那是在69——71年左右，各地实行的时间不一致，但是都搞了这么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有多个目的，其中一个就是把造反派中的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清理出去。但是在刚刚造反夺权的时候，由于周恩来手下的干部的阻击战，老工人都成为保皇派，江青一伙只能依靠这些成分出身有点问题的年轻工人。也就是说，周恩来看出来：他自己和干部集团，并非完全没有抵抗的力量。共产党这十几年，到底对产业工人有恩，让他们进城当了工人，比农民的生活好很多，而且有劳保和固定工资，而且不受解雇的威胁。我们知道，以前国营企业的工人的地位相当高。这就是资源，可以依靠这一资源，在和江青作一场大规模的反夺权阻击战。他知道阻击战不太可能成功，但是却能把整个政局搞乱，各地的派别战争打得热火朝天。而且，打派仗和打冤家相似，越打仇越深，没仇的可以打出仇，最后打得不共戴天。事实证明，各地，特别是工人集中的大城市，很快就发展到了这一步。这一下子，干部们就是被

打到了，江青也控制不了局面。因为有保皇工人在和造反工人作对。两边势同水火。江青的用中央文革控制造反派，用造反派夺权掌权的计划，就必然破产了。

一是由于江青忙于北京上海的事务，没有办法到各省坐镇，二来是她本来身体不好，能力低下，中央各部的夺权都没有搞好，对于各省力不从心。三来是各省政府和部分军区领导，都是沙场老手，都对老周的策略心领神会。老周把江青拖在北京，而他们在外地分别自卫。江青和中央文革能派出去的干部，都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之类的低级干部，都在十六级左右，解放战争甚至之后再参加工作。而各省各部大员大约都是六级到八级的干部（中共干部级别分为23级），绝大部分是红军干部，少数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干部。在中共系统中，资历非常重要。这些中央文革的小干部到了地方各省，地方干部根本不听他们的，也根本看不起他们。比如说，王力戚本禹到了武汉，去支持当地的造反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就把他们关起来了。武汉市四十万人，号称“百万雄师”保军区的工人组织，举行大游行，反对中央文革。这使中央文革大惊，向毛泽东报告说陈再道要搞兵变。毛泽东自己亲自出马，把陈再道抓起来。陈再道之类的地方大员有几百个，有的明着对抗，有的暗中捣乱。另外一些人，比如云南的阎红彦，为反抗造反派自杀了。自杀前说是中央文革把他逼死的。阎红彦是红军老干部。也就是说，中共干部当中，有不少冒死抵抗中央文革夺权的人物。如此一来全国大乱。笔者当年在全国各地“流走”，在闹市之中，只听见各派的大喇叭震耳欲聋，高楼之上传单如雪片搬飞下，各派队伍持棍棒枪械怒目而视。完全是一幅战乱景象。面对这样的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绝对不能久拖不决。他被迫作了两件事。

一是让林彪军管。二是继续依靠老周。这两件事互相关联的。让林彪军管了，就必须依靠老周。因为没有老周制衡，林彪的势力太大。林彪手下有军队，军队的力量，比起中央文革江青班底，或上海工人，那不知强多少倍。结果大批野战军下地方军管。政局基本上稳定住了，但是，权力落入林彪之手。我们必须重视老周这一“保皇阻击战”的作用，笔者十分欣赏其谋略水平。老周实在是久经沙场的统帅级人物，在文革他处于绝对的劣势，毛派林派都比他强。但是他能在劣势之中，看出门道。那就是如果他作一阻击，情况会有很大不同：全国大乱，派仗横行，江青计划的造反夺权，必然失败。这时只能依靠军管。而一旦军管，权力必然落入军队之手，而非江青的中央文革之手。离间毛林之计，就可能成功了。当时广东省委书记为赵紫阳。赵是聪明人，文革一来，就知道造反派有毛江支持，对抗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刚一造反，他就把所有政府印鉴，打成一包交给了造反派。周恩来听说之后大为不满。说，“就是小孩打架，也要打一场”。就是说，明知不能成功，也要打一场阻击战。赵紫阳不打这场阻击战，很容易让江青的工人和学生的造反派顺利夺权。这就不能挑起林彪和毛江之间的冲突。

一旦军管，毛泽东更加注意防范着林彪。他安排了周密庞大的制衡网络。上层始终留着周恩来和叶剑英。下面军区一级有毛远新坐镇东北，许世友坐镇的华东。李德生谢富治（外加纪登奎，毛的亲信）坐镇华北（北京军区）。后来连中央军委负责日常工作的，也换上了李德生。林彪实际掌握的大军区，只有广州一个。这样一种布局，怎么是让林彪接班的势态？林彪在最后从山海关逃跑，本准备逃向广州，不管是在广州和毛对峙，还是逃亡香港，都容易做到。此南逃计划为真。因为飞机起飞之后，飞行员讯问过广州白云机场的天气。该地回答说是“碧空”（巧得很，答话的白云机场报务员是刘亚楼的小女儿）。但是飞机升空之后，掉头西北。估计他们就发现，如逃向广州，必须经过北京、武汉两个军区，一路上在中国领土上飞行，下面机场和防空基地密布，中途被打下来的可能性极大。林彪乘坐的是飞得又慢又平稳的客机，是最容易打的活靶子。所以只能选在国内走最短的路线，也就是在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之间的结合部，直接往蒙古逃跑。这当然也说明林立果等人事先没有周密计划。因为秦皇岛的位置，实为一个绝地。它被沈阳北京两大军区夹着，根本无路可走。林彪之所以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候，跑到秦皇岛这样的绝地，实在不好理解。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广州等着。我们只能猜想，他或林立果认为，鲁珉在江苏截击毛的火车，一定成功。而林彪这时应该在北京附近，以便成功后马

上回京，逮捕老周等一干人马，夺得首都的控制权。实际上鲁珉因为害怕，称眼疾躲在家里，把进入伏击圈的毛泽东放走了。这也说明林立果的愚钝无能。截杀毛泽东这样重要的事情，他自己居然不亲自坐镇。鲁珉自己一定会想：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他都一定会死。失败了不用说，成功了林立果一定会把他当作替罪羊，说是他暗害毛泽东，杀了他灭口。

林彪一死，文革就算失败了。因为毛泽东再也找不到有实力的顾命大臣。后来毛泽东启用邓小平华国锋，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毛泽东知道，当时政治局中的几个元老，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都是坚决反对他传位的。

五、太太参政

现在我们必须说明，家庭成员参政掌权，起于文革之前，其发起人是刘少奇。我们知道，家庭财产可在家庭成员中分享继承。以前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庭财产，政权由老婆孩子分享继承，为天经地义。蒋介石这么作了。但是共产党在60年代之前，还没有出现这类情况。但是到了60年代初，情况突变：刘少奇先生开始让太太出现于前台，并逐步参政。一开始进行的是出国访问。然后在全国广泛放映“刘主席访问某国”的纪录片。要说国家元首的太太随夫出国访问，是世界通行做法，并无不妥。但是过多的出镜率，就造成王女士地位的突然上升，以至家喻户晓，无人不识。因为当时没有电视，视觉宣传全靠电影。当时普及电影，一般人每周看几个新闻影片，所是最主要的视觉信息来源。然后紧接着就出现了四清。四清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以刘太太的“桃园经验”为开始。该经验在全国推广，被印成小册子，是所有干部必读文件。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学习讨论。就连高中生都要学习。王女士在人大大会堂作报告，刘少奇先生亲自聆听，并鼓掌。还说“她的水平超过了我”。然后在京的十三级以上干部部分批到人大大会堂听录音报告——只是王女士报告的录音，王女士本人并不在场。台上的录音机在转，下面的干部还要鼓掌。那时全党全国确实掀起学习桃园经验的高潮，王女士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新星。

在这之前，共产党还没有把太太搬出来当政治人物的先例。所以刘先生此举，是一个不好的开头。当时很多元老级的人物和太太，对此都相当不满。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不知道王女士将会得到一个什么位置。

随着刘先生抬出了太太，林彪等人也把太太变成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可不是小官，林彪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的办公室主任的级别应是兵团级，权力上总揽军委的一切日常事务。当时各军种和总部向林彪汇报，并不能直接面对林彪，而是把报告交给林办，然后由林办发回批示。至于这批示来自林彪还是来自叶女士，谁也不敢问。当时空军司令刘亚楼曾对同事说过：“你必须直接向林总回报，如果经过叶群，就变样了”。但是要绕过叶群直达林彪，是不可能的。只有刘亚楼这样和林彪有长久关系的（刘为四野参谋长），才有很少的机会，以老部下的资格，直接见林彪。

问题是刘林（刘少奇和林彪）两家的太太掌权，是经过谁的认可。或者，这事是否就是他们二人自己想这么干，就干了。笔者在其中有一极大疑问，并在此作一大胆假设：刘林的太太掌权，得到毛泽东支持。（卡玛女士对笔者说，为拍“八九点钟的太阳”她曾访问王光美女士，王女士说是毛让她出来的）。支持他们的理由，是以他们二位打前锋，为江青出台做好准备。用他们二人的太太打这个前锋，是非常合适的。在中共高级干部内部，太太分成两伙。一伙为老红军派。如朱德周恩来的太太。一伙简称“新的”。这简称可不是笔者自创，而是老一派对年轻的那几个的称呼。我们知道，中共内部最喜欢用简称，类似密语。毛刘林三人的太太，都属“新的”。江青是三人中年纪和资格最老的。所以以刘林的太太打参政前锋，如果得到世人认可，江青的出台就顺理成章。

从另一方面说，笔者认为，如无毛泽东的认可，刘林绝对不能也不敢让太太出台参政。至于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太太的任务是为江青打先锋，笔者认为他们绝对地知道。也就是说，他们让太太出台参政，必是毛授意支持。他们也应该知道自己是在为江青打先锋。假设他们没有得到毛的准许，不是为了江青打先锋，而自己擅自让太太参政，那不但说不通，而且也绝对不像刘林二位的为人。刘林二位本人和其他中共元老一比，实力和资格都不是最强。刘少奇在军队中没有实力，林彪在党政中没有实力。他们二人都非元老级人物。他们的上升，都是靠毛泽东的提拔。或者说，这二位从来就紧跟毛泽东，不敢有丝毫差池。如果毛示意让刘林作太太参政先锋，他们就会把这当作上级命令，而努力执行。

于是我们面临第二个问题，就是毛让他们的太太参政之时，是否就已经准备好在适当时机，将其消灭，把他们两家，作为毛一家掌权的牺牲？

笔者认为此一问题可有两个答案。其一为：毛泽东在60年代初并无此打算。但是后来他们的没有掌握好分寸。引起毛夫妇的猜忌，而招引杀身之祸。答案二：从一开始（刘太太出道之前）毛就打算好了整肃他们。至于哪个答案是真，那就是千古之谜了。我们只能假设：毛泽东的传位计划有点说不出口，因为这和共产主义理论差得太远。所以从解放以后，他在寻找顾命大臣。但是他不能说他在找顾命大臣，只能说是找接班人。一来是因为传位给家人，不好说出口，二来是毛可能知道，如果他说找顾命大臣，一定有很多人争相表态，拥护江青毛远新接班，自己只当大臣不当接班人。但是这种表态一定是假的。毛一死，这些人都靠不住。毛需要找的是诸葛亮这样的人，就是让他当接班人，他也不当，他坚决地自发地要给毛当顾命大臣。所以毛给刘林二人以大恩，就看他们有没有悟性，是不是能知恩图报，建立毛氏王朝。毛泽东发现刘林二位都没有知恩图报到这种程度，才把他们整肃。

大家或许要问，毛泽东为什么不选周恩来作顾命大臣，这也容易理解。周恩来以前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更高。而且势力强大。自己又没有孩子，即使有亲属，也故意地赶的远远的，不让他们沾光，这就是对毛泽东说，共产党员不能传位。不能搞家天下。周始终一贯地持有这种态度，毛泽东怎么能让他作顾命大臣？说实在周恩来和朱德二人，一直在给毛泽东难看。特别是周最后死了，把自己的骨灰撒了，还在遗书上说，共产党员不能在八宝山争座次。周恩来一方面早早就收集楠木，准备给毛泽东作列宁式的尸体展览，一方面又把自己的骨灰撒了，其用心就是“和你作对比，让你难看”。你难看了，你的事就不好作了。这是周恩来对抗毛泽东的惟一可能的办法。其他办法都不可能成功。朱德没有周恩来这么机灵，但是也把自己的家属都赶的远远的，不让他们沾光。也算是跟周恩来学习。周恩来计划好了和毛泽东周旋到底，但是绝对不让你传位。第一代君主专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第一代君主靠战争出身，有军队支持，周恩来自知无力扭转。但是让这专政传不到第二代。应该说周恩来成功了。朝鲜没有周恩来这么个人，他们的君主专政传到了第二代。毛泽东知道周恩来的这个计划，所以毛泽东绝对地不可能培养周恩来作顾命大臣。其他人也不行。只有刘少奇林彪曾经神化和吹捧毛泽东。所以只能选中他们俩，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六、传位方式

我们知道，古代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之间，有两种关系。一种关系如东汉刘秀，和唐朝李世民，曾和开国元勋约定，以后世代通婚，互相扶持。另外一种关系如刘邦和朱元璋，其特点是大杀功臣，以防他们谋篡帝位。等把大臣杀光了，以后可以善待他们的后代，作为补偿。刘邦杀了大臣，让太太吕后帮助儿子继位。毛泽东的传位方式类似于刘邦。我们知道刘邦是怎么杀功臣的。刘邦也是毛从来最欣赏的一位帝王，刘邦也和毛泽东一样看不起知识分子。（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背诵刘邦的大风歌）。毛的文革基本是一场对元勋的大规模整肃。因为这些人对传位

是一大威胁。朱元璋杀大臣的时候，他的太子表示反对。朱元璋就找来一个带刺的树枝，让太子用手拿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就说，我现在杀大臣，就是把这树枝上的刺给你砍掉。结果太子说：上有尧舜君，下有尧舜民。意思是你作事作的好，部下不会反对你。朱元璋气得不管树枝上的刺，拿起来就追着打太子。毛太子远新，没有朱太子的那么书呆子。毛夫人也没有朱夫人马皇后那么吃斋念佛有善心。所以这杀大臣“砍树刺”行动，也就搞的史无前例地轰轰烈烈。

家族权力斗争是文革的重点，“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文化斗争”，全是烟幕弹。家族权力斗争必以亲疏划分阵营。在文革中亲疏关系成为了一切问题的关键。亲疏程度决定你是那个阵营的。也决定你是升官还是被整肃。这关系想改也很难改。亲疏是可以放大的。比如林彪和自己的老部下为亲，他的老部下自己又有老部下。如此一层层下去，就形成关系网。文革之中突然凸现关系网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在津津乐道地说着人的老关系。所有关系中最密切的，是家庭关系。所以所有大官的太太都或明或暗地参政，几乎所有军区和省一级的领导，都由太太们直接参政了。领导们的儿子都顺利上升，成为接班人。所以毛刘林的家庭权力之争，演变成派系的权力斗争。当然这派系只是家庭的伸延。在林彪当权之时，四野干部，特别是林立果所在的空军，地位迅速上升。其他山头的干部地位则下降。等到林彪被解决之后，一二三野的干部的情况才有所好转。毛泽东躲过林立果（派鲁珉实行）的半路袭击（从上海回北京的路上）之后，乘火车安全到达北京，先去了一趟陈毅的家里。说明对陈毅的重新启用。也是用陈毅的三野的山头，对抗林彪四野的山头。但是陈毅等人对江青毛远新继位这种事，坚决不认同，其态度属于“你有大功劳，给你保驾。我是共产党，不让你传后”。所以陈毅不能作顾命大臣，后来也没有被毛重用。在林彪死后，毛泽东只好让江青和毛远新自己培养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江青比毛远新干得好得多。江青培植了上海帮，在林彪死之后，都被提拔到最高职务。其中王洪文成为中共副主席，有成为新一代接班人的可能。他们还在上海建立规模很大的工人民兵。在毛死后，四人帮被解决之时，江青系人马计划在上海武装起义，作困兽之斗。但是毛远新系列的人，就没有一点表示。据说在毛泽东死后，汪东兴为了吓唬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了两个师进京，已经到了山海关。这迫使华国锋同意立即解决四人帮。但实际上毛远新没有作这事。毛远新在沈阳军区根本就没有可靠的下级。没有人能说出毛远新的嫡系人马是谁。我们知道林立果的手下“死士”，还有这么几个。所以说毛远新真是没用到了极点。又说回来，如果不是这么没用，也早就和林立果一样，曝尸荒野了。正所谓阿斗自有阿斗福。

（未完待续）

~~~~~

## 【往事如烟】

### 亲身经历：毛远新执政期间的辽宁

• 李 工 •

网上看到有人说媒体在报道毛远新又出来活动了。有年轻的网友在问毛远新是谁。我虽然没有见过毛远新，但是在文革后期他执掌辽宁期间在辽宁住过，亲眼目睹他把辽宁搞得民不聊生，成为全国生活最苦的省份之一。很多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况。这里就我所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老百姓的生活。

毛远新最臭名昭著的是把辽宁搞到一个月每人只有三两油。（当时的人不敢骂有着特殊身份的毛远新，而骂陈锡联“陈三两”。其实陈当时是沈阳军区司令，并不主管辽宁省的工作。）

肉是不定期供应的。每年年初一人发60张票。商店里不定期地公布这些票可以买什么东

西。有的是买糖，有的可以买茶叶，也有的是买肉的。我当时没有统计过，凭记忆大概是一个月到一个月半月能有一张肉票，每张肉票可以买半斤猪肉。牛肉羊肉好像是根本没有吃过。由于油只有三两，大家就都喜欢买肥肉，舍不得吃肉，是把肥肉炸油，炒菜的时候就是放一勺白花的猪油。记得和父亲去买肉的时候，很多人宁愿让后边的人先买，自己等售货员切到肥肉的时候才买。

粮食当时也是不够吃的。不光农村有人吃不饱饭，城市里孩子多的家庭粮食也不够吃。当时要买粮食不光要钱，还要凭粮票。连在饭店吃饭也必须交粮票。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定量是30斤。孩子还少。在缺油少肉的情况下，人们对粮食的消耗特别大。象我在工厂食堂吃饭，菜基本是水煮的，肉是根本没有，一顿吃6两玉米饼是很普通的。粮票（不是粮食）当时在黑市卖到一角六分（可能不太准确）。以当时平均月工资36块钱的水平，30斤粮票的价值就超过月收入的八分之一了。

有了粮票能买到的也是粗粮。当时每人每月只能买到两斤米，两斤面。其余只能买玉米面，杂交高粱。杂交高粱是一种为了高产的数字而搞出来的粗粮。我一个朋友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从小吃粗粮长大，都不肯吃那个杂交高粱。下乡的同学说那东西喂马，马都消化不良。有一段时期还吃过榨过油的玉米。据说是出口到日本的玉米，日本人轧了油，我们再运回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吃。还听说当时的粮食部门象上级报告说这种玉米面不适合给人吃。上面批示继续卖。这些内部消息我当然无法证实，当时也没有人大代表质询之类的事，政府的操作是完全封闭的。但是我确实吃过那榨过油的玉米饼。比平常的玉米饼更松散，不成团。

那60张票里，最贵重的是最后一张，第60号票。稍微抢手一点的工业品都是靠它。譬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所谓的三大件。但是一张票时不够的，只好把家里的票集中起来，一年也许能买一件。当时年轻人最时髦的就是能拥有一辆上海产的锰钢自行车。大概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开宝马一样的吧。那样的自行车要多少张票，我是不记得了。反正我们全家的票加在一起也是不够的。记得我文革后我上大学了，市场上供应宽松了。我父母终于给我买了一辆锰钢车。其实那时我在外地上学，并不需要。但是父母还是买了一辆算是给我的。大概也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

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辽宁并不穷，不光工业是当时全国的基地，农业也很发达的。盘锦的大米，锦州的苹果（毛选里都提到过），都是驰誉全国的农产品。事实上，文革前肉从来都不缺的。1968年文革高潮期间，忽然肉要凭票供应了，当时的说法是阶级敌人把猪给毒死了。当年掌权的人就是拿这样可笑而且缺乏常识的谎言来蒙骗老百姓的。文革结束后，不到两年，农业就恢复了，肉也敞开了。记得78年夏天我暑假回家，人们就已经开始要求售货员给切瘦肉了。事实证明，辽宁人民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完全是人祸，是毛远新之流为了政治目的，不顾人民死活倒行逆施的结果。

民族主义是当今很流行的时尚。有些人讲不出道理就喜欢用不爱国的大帽子来压制别人。其实在我看来，爱国最基本的是要爱这个国家的人民。那些为了一己的政治目的，置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甚至造成大批人民“非正常死亡”的人是有罪的。不判他的罪，自己也应该闭门思过，夹着尾巴做人。然而时至今日，并没有听说毛远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过任何的忏悔，也从未有公开向人民谢罪，却跑出来参加公众活动，而媒体也积极炒作，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当时的辽宁民不聊生，当时的媒体却天天在唱赞歌，天天歌颂“大好形势”，天天深情地告诫老百姓们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不要忘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些在凭票买糖的时代长大的青少年居

然被称为是“糖水中泡大”的一代。这就是当时的媒体。

现在网上仍然可以看到有人在引用文革时期的统计数字作为辩论的依据，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太天真了。当时辽宁的生活这么苦，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去查当时官方的统计数字一定是说粮食增产多少多少，猪肉增产多少多少。最近看到一些人仅仅根据一两本史书的记载，在没有任何实物证明的情况下就大胆推断郑和当时的大船为长达130多米的万吨巨轮。（唯一有关的实物是一个农民家里收藏的大锚，据专家说“有可能”是郑和的船用过的。）由此想到一百年后，当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不在了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某个博士生作论文的时候从故纸堆里找出些文革时的统计数字，并根据这些数字得出辽宁人民“文化大革命”期间生活如何如何幸福的结论？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看，文革时期的官方数字根本没有资格作为研究资料，更不能用来作为辩论的依据。建议中国史学界和其他学术领域都将这一条作为共识传给后人。

~~~~~  
【人物追踪】

毛泽东之侄17年刑满后的生活近况

· 马社香 ·

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他使用的是“李实”的名字。这个名字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时，正式向学院提出申请改名为“李实”。经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在空军部队工作时都用此名。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李实的真实身份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

“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报到时，所长的介绍可谓虚虚实实。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职务是“办事员”。他埋下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熟悉了业务，不久便成为所内技术管理的骨干。两年后，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发现李实是个难得的管理人才，向所长建议提升他担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一时不知如何向副所长解释才好，就向毛远新征求意见。“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毛远新说。

所长舍不得“浪费”人才，便把制订、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交给毛远新负责。那两年，毛远新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全所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毛远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全所上下的一致称赞。

进所不久，一次全所党员开会，毛远新坐在办公室“岿然不动”，一位同事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去开会？”

毛远新坦然地说：“我又不是党员。”

“你怎么不是党员？”这位同事觉得不可理解。一个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又转业到省级公安机关工作了多年的人，居然会不是党员？他满目狐疑。

毛远新笑着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党一样能为国家干事。”

“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

“也许吧。”毛远新似是而非地微笑了一下。

由于刑满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4年，毛远新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到了基层普选的日子，全所职工都要排队参加投票，一个人也不能缺席，怎么办？所长就提前安排他到外地“出差”，顺便去检查治疗腿病。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待人处事质朴谦和，他几乎年年被大家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放大的照片挂在大门口。

1997年，上海某报透露了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的消息。“李高工就是毛远新”在研究所已成心照不宣的事实。好在一起共事多年，大家早已熟悉了毛远新的处事为人，不仅没有另眼相看，反而更加敬重，只是没有主动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许多人已成了他的好朋友。

毛远新和女儿莉莉也经历了由完全陌生到父女情深的过程。

女儿莉莉1977年1月出生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3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时高烧不退，因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

1982年毛远新第一次见到随妻子探监的女儿，又惊又喜，他多么想把5岁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莉莉却瞪着一双充满恐惧的大眼睛，迅速躲到母亲身后，说什么也不让这个陌生人碰自己一下。

后来，一家三口虽然住进了上海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莉莉却总是躲到舅舅房间里，毛远新想摸一下她的手，她都赶紧缩回去。加上语言交流困难，父女之间难以沟通。“是我连累了她……”自责使毛远新难以入眠。

从帮助女儿学习入手，毛远新父女关系开始起变化。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初中毕业后，莉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莉莉走上工作岗位，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莉莉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2000年拿到了毕业证书。现在，毛远新正帮助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升本的考试。

随着女儿学业和工作的进步，父女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是莉莉处处主动关心照顾年老的父亲了。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毛远新的工资从1993年的600元逐渐长到了2001年的1600元。2001年2月，毛远新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并享受烈属待遇。

□ 摘自《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

~~~~~

【史海钩沉】

毛泽东和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李 刚 •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文革”期间关于高等教育的指导性文件。它是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结果，会议开了三个月另十七天。会议《纪要》由迟群起草，经过18次的反覆讨论，反覆修改，最后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了两次修改，经政治局讨论定稿。8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1〕

《纪要》的下发和贯彻促使“文革”期间极“左”教育体制进一步发展。《纪要》基本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教育工作，错误地提出“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黑线专政”；知识份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两个估计”中的两个“基本”把“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说得漆黑一团，是强加给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2〕

文革结束以后“两个估计”理所当然遭到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正式撤销《纪要》的通知，指出：“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及其亲信一手把持下炮制出来的，是错误的。它在教育战线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应当继续批判。〔3〕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4〕（以下简称〈论战〉）和署名“《人民日报》本报记者”的《“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两篇长文，揭露了张春桥、姚文元等操纵会议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5〕

〈论战〉指出：教育战线是我们党同“四人帮”长期争夺的一条重要战线。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形势如何估计，对知识份子状况估计，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广大群众认为：十七的教育路线与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的知识份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应当充分肯定。而“四人帮”却把“两个估计”抬到了吓人的高度。

他们叫嚷：谁反对“两个估计”，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实际情况是：“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份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至他们的灭亡。现在是把他们的阴谋和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的时候了。

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二）多数知识份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有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份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在“四人帮”反党气焰极端嚣张的困难情况下，七月六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决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份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



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要作个案分析，不然大家就灰溜溜的”。周总理的指示，同样受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6）

《论战》一文的核心就是说：“两个估计”是“四人帮”背着毛泽东搞的，完全背离了毛泽东对教育战线和知识份子状况估计的指示，“四人帮”要对“两个估计”的出台负完全责任，而毛泽东却没有责任。我们认为在“两个凡是”还未遭到批判的历史条件下，《论战》一文的发表对促进思想解放，促进知识份子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伟大的历史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论战》的写作方式及其背后的政治思维习惯还没有摆脱“大批判”的模式，《论战》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处理上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缺少科学性。《论战》虽然推翻了反动的“两个估计”，但同时也开脱了毛泽东对“两个估计”的出台所应负的责任，不利于对毛泽东晚年极“左”错误作深刻的历史反思。

## 二

“四人帮”对“两个估计”出台应负的责任是免不了的。但是“两个估计”主要还是反映了毛泽东在知识份子问题上一些错误思想。建国以后毛泽东对教育战线一直是不太满意的。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7）：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份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中产阶级的，他们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革，现在这样还不行。他还说，课程多、压的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毛泽东也批评现行的考试方法，指出现在的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甚至说（8）：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甚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同年6月4日和王海蓉谈话时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9）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又发表了关于教育制度的讲话。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年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么做工，看不见农民怎么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他提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他认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10）

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二月提纲》时说：“学术问题，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我们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手里

掌握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垄断了。”（11）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在《十六条》中指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1966年5月7日，他在审阅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业、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给林彪的信中说（12）：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13）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就教育革命问题说：“对资产阶级教授我们还得利用，不然我们没有呀，不过，他们也得听我们的话，有些人嘴里也讲听我们的话，但心里老是埋怨。”毛泽东又说：“过去也有些进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讲完全不对。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一条，就是教育从根本行来一个革命，在最近几年才开始。”（14）

### 三

从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个估计”和毛泽东的思想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哪个《论战》引用的被“四人帮”封锁的1971年指示又如何解释呢？

首先，谁敢封锁毛泽东的指示？1971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五年，毛泽东的身体还没有甚么大问题，毛泽东的权力处于顶峰，对局势能完全控制。毛泽东对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便于毛泽东阅读，会议简报是用二号字印刷的，每期皆报送毛泽东。毛泽东1971年8月14日到南方数省巡视，准备解决林彪问题，在临行前一天，即1971年8月13日批准了《纪要》。甚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一年后，对会议上的一些细节也记得很清楚。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周培源随同被接见。毛泽东对周培源说道：“你的讲话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指周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大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15）周培源补充说：“那个发言后来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指名道姓地说：“上海复旦大学的谈家桢就不赞成你的文章。”（16）毛泽东有各个方面的信息渠道，所以想封锁毛泽东的讲话和指示既做不到，而且谁也不敢。况且“四人帮”存在的基本政治资源就是毛泽东的信任，一旦离开毛泽东的支持，“四人帮”就只有垮台。《纪要》的起草人迟群和主要修改人张春桥、姚文元都善于而且极力揣摩了毛泽东的意图的高手，他们是决不敢封锁毛泽东的指示的，或许在小方面有出入，但在大方向上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因此“两个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迎合了毛泽东的意见。

那么那个1971年的指示从何而来？到底是不是毛泽东的指示？

据参加〈论战〉一文写作的《人民教育》总编辑吉伟青回忆（17）：

在〈论战〉写作的后期，正当写作组和部领导感到稿子显得有点平淡，批判的力度还不够深刻的时候，偶然发现，毛主席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问题曾同“四人帮”部成员谈过一次话，针对“两个估计”发出了重要指示。可是“四人帮”严密封锁了这个指示，一直未向与会同志传达，只在“四人帮”分管科教工作的极少数骨干和亲信中作过传达。首先发现这条线索是《人民教育》编辑组长孙长江，他当时是审查“四人帮”在教育部的余党骨干份子薛玉山的专案组组长。他在查看薛的笔记本时，发现笔记本上记录不全的毛主席指示，立即向李琦同志作了汇报。教育部党组随即请示中央审查办，请求查看迟群、谢静宜（迟群、谢静宜当时是“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亲信，任科教组长、副组长）的笔记本。由孙长江同志负责审阅核对他们笔记本中关于毛主席1971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指示的纪录。整理后，经写作组研究建议，报教育部党组请示乔木同志同意，决定写进稿中，用毛主席对教育战线和知识份子的评价，有针对性地驳斥“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谬论。

但是，写作组在中办和中央档案馆都没有查到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原文，所以在发表时称为“毛主席的指示精神”。（18）

无法搞清毛泽东是在何时、何地 and 何种情况下发出这个“重要指示”。可见，作为〈论战〉核心证据的所谓的毛主席的指示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在可靠性上是有问题的。连当时教育部“大批判组”的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毛主席的指示”，而只能说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何况当时对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的记录和传达是极其严肃的大事，毛泽东对迟群等人的私下谈话恐怕不是甚么“重要指示”，甚至不是甚么“指示”。

即使我们承认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精神”，也无法从中得出毛泽东反对“两个估计”的结论。“（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二）多数知识份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实际上《纪要》开头部分是肯定十七年教育的所谓“巨大成就”的，但这并不妨碍《纪要》马上接着就讲“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多数知识份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实际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和“两个估计”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周恩来也不得不讲（19）：

尽管有些人是解放后当教员的，但由于教育制度是旧的，方针、政策是旧的，虽然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是对的，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了我们学校”是一个意思，他们是搞修正主义的。不然，为甚么在教育上没有彻底改革呢？为甚么毛主席的号召没有执行呢？

周恩来作为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他必须把毛泽东的意见贯彻下去，自己心里未必同意。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0）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知识份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21）完全推翻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对毛泽东在知识份子问题上一贯立场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得不说“违心话”。如果真的有毛泽东的反对“两个估计”的指示，哪怕是“指

示精神”，周恩来怎么可能不把它拿来打击“极左势力”呢？

即使在当时情况下周恩来对“两个估计”还是有保留的，他说：“但不能说主席的红线没有射进学校。学校不能脱离社会（从整个国家来说，十七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主席的红线还是照耀着学校的，而且有些时候还是有力的。对教师队伍和十七年教育出来的学生要有个正确的评价。要说清楚教师、学生队伍大多数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接受党的领导的。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文件拿下去就不能起动员作用。”〔22〕

从以上的多方面情况看，“两个估计”是《纪要》的核心观点，反映了晚年毛泽东对知识份子问题的基本认知。这种错误思想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批评研究，是因为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乃至主流意识形态中长期存在的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名义上否定，实际上回避”的态度。这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历史叙事模式，极大的阻碍了对当代中国历史反思的深度和精确性。

#### 注释

〔1〕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档案（卷号：短期065）。

〔2〕李刚：〈1972—1976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过渡性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127页。

〔3〕〈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五卷（1976—1988）》（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页5343。

〔4〕〈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第1版。

〔5〕〈“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第2版。

〔6〕〈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第1版。

〔7〕教育部大批判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

〔8；9〕《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页32；34。

〔10〕本书编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三卷（1960—1966）》（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页3453。

〔11〕转引自金一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320—321。

〔12〕毛泽东的这封信产生于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后由林彪转呈中央，于1966年5月15日转发到全党。1966年8月1日，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将它的基本精神传播到全国。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学者王年一认为：这封信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一起，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动机的两把钥匙。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页945。

〔14〕《中央首长指示的主要精神》，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档案（卷号：短期065）。

〔15〕周培源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大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核心是反对“理向工靠”、否定理科教学的做法。此文后发表在1972年10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封信击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领域中鼓吹极左思潮的要害，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份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示。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育、科技领域里引起了很大的

震动和反响。文章涉及的直接内容是教育和科技，但其重要意义却在于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上，对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提出了公开挑战。

〔16〕奚学瑶：〈周培源与北大的不解情缘〉，《中华儿女》，2002年10期，页73。

〔17；18〕吉伟青：〈“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页74；75。

〔19〕《中央首长指示的主要精神》，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档案（卷号：短期065）。

〔20；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242—43；254。22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档案（卷号：短期65）。

□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〇〇三年四月号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